

張承烈字梅來吳江黃諸生
當永樂時有西湖人實姓國
為僧主寺建得舊寺以償之
相而痛哭張慨然出金其之
俾僧員及張主理是年麗江南
御設省八瑞王題下張以羊
羖為無尤舉子不第咸集一
沈西人之儀而飯家待待先一
黃芝芳人以宮作三為特贈
視之即此題發揮切實出色
當行張喜極贊願乃一夢也
記性頗強是起陽之自是次
場之候無王瑞之東皆出若
人考筆叩以姓氏曰我與君
官書贈自後自知其喜而去
及瑞王西瑞訪實姓見被
夫瑞敬逆而賀曰先生高中
經魁夫何知知之婦曰女
翁氏父為廣文主前有僧學
善制卷無主生女一人聘妻
翁父喜曰汝婿不自上汝我
為翁翁張先生德我感之奉
報以王瑞文已發制中家
張氏曰王瑞王瑞有

高考思辨

郑若玲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登科佳話

2010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NCET-10-0720) 资助项目

張承烈字緒東吳江賓諸生
嘗承其時有西瑤人實姓國
為債主子得售妻以償之
相向頭蓋概發出金兵之
俾債負且還足年應江南
鄉試省三題下張以筆
墨荒蕪無筆不結成隻字
沈思久之而假寐彷彿見一
戴笠者人當作云為特贈
視之即此發揮切實出色
當行後其寶釀乃一步也
記憶頗強起後之自是次
場之徑起一場之果皆出若
人手筆即此此曰我與君
當實路自當知家而云
及婦潛歸瑤實姓見徒
夫婦歡喜瑤曰先生高中
延勉矣以知之婦曰妻
富氏父文生前有隙學
善制器生妻一人昨夫
弟告其妻不自主汝就
吳弟類主德我戲之夢
中報以夫已發刻中第
天張聞富氏大
喜曰吾得
一書曰



高考思辨

郑若玲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考思辨/郑若玲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141 - 3212 - 0

I. ①高… II. ①郑… III. ①高考 - 文集

IV. ①G632. 47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3920 号

责任编辑: 张庆杰

责任校对: 刘欣欣

版式设计: 代小卫

责任印制: 王世伟

高 考 思 辨

郑若玲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辑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市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18.75 印张 380000 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3212 - 0 定价: 4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本文集

献给含辛茹苦培养教育我的父母
献给普天下关注高考的莘莘
学子及望子成龙的父母

序

中国现行的高考体制是一种政府主持下的大规模统一考试。这种体制，肇始于科举制度，由于与学历社会的国情相适应，流行于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虽然各国的做法有所不同，但都由此演绎出许多是非非的问题，牵动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人都有话可说、历久不衰的热门话题：广大的应考学生及其家长，本于利益相关提出种种话题；政府管理与办考人员，有来自政策与经验的话题；高考研究工作者则力图在群众意见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从历史的演变与域外的比较上，提出理论观点与改革建议。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是全国科举制与高考体制理论研究的重镇之一。在刘海峰院长的研究基础上，形成了一支人才辈出的研究队伍，散处于全国各地的教育考试院和有关研究机构。处于重镇中的郑若玲教授，是其中造诣较高、成就卓著的中青年优秀人才。她所撰写的高考论文很多，研究领域涉及面很广。这本《高考思辨》论文集所收集的21世纪以来的论文就达51篇，涉及高考的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高考的科举渊源与域外的高招比较，以及高考改革中广受关注的种种问题。作者的基本思路是以公平为圭臬，以历史为照鉴，深入现实之中，提出精辟见解。有理有据，侃侃而谈。

高考问题，既然是人皆有话可说的热门话题，也就容许有不同见解、不同批评与不同建议。郑若玲的《高考思辨》，虽然是一位研究有素的专家的研究成果，视野宽阔、见解深邃，是非得失的权衡，十分严谨，但也应视为作者的观点与意见，而不必求全责备，强求一致。我虽站在高考理论研究群体边缘，查阅《文集》^①，也索得有关高考短论五篇

^① 参阅《潘懋元文集》卷三《问题研究》（上）之第三部分“高等学校招生与就业”，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仅及郑若玲结集的十分之一)。在与陈厚丰教授合写的《从恢复统一高考三十周年说起》一文中,就提出三个人们习以为常、想当然尔的认识问题,也是高考改革走出既定框架所应探索的问题:

——考试制度的公平性,只是体现于“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还是更应体现于“人尽其才”上的平等?一次性的统一高考表面上的公平,掩盖了教育过程所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和“人尽其才”的不公平。要让每个大学生都能够受到最合适的教育,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需要、个人乐业的专门人才。

——进入高教大众化阶段,高考是选拔性考试还是适应性考试?当绝大多数高中毕业适龄青年都可以而且应当进入高等学校时,高招应当通过多样化的考试或非考试形式,进行双向互动互选:高校根据不同的专业培养目标与要求,选择适合的新生;考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能力、性向,选择适合的高校和专业。

——高考应当着重考学生所长还是着重考学生所短?“天生我材必有用”,问题在于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统一高考却长短不分,甚至出难题、偏题、怪题,并以标准答案压学生的创新思维而扬学生的“死记硬背”。学生处于被动地位,为了应试,只能力求补其所短而很难展其所长。

这些问题,有的在《高考思辨》中有所涉及,有的则仍待进一步探讨。

总之,非人性化的统一高考必须改革。但如何改革,既要符合教育规律,其中包括学生成长的规律;又要照顾到传统理念、思维定势、学历社会种种国情社情的制约因素。由于高考改革面对的问题复杂,人们的认识多样,《高考思辨》中的个别见解、建议,读者不一定都认可;但《高考思辨》所提供的改革思路,对读者具有启发与引导的作用。

潘懋元

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12年12月20日

目 录

高考与社会

高考改革必须凸显公平	3
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以厦门大学为个案	6
高考公平的忧思与求索	13
“举国大考”的合理性	
——对高考的社会基础、功能与影响之分析	29
高考改革：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36
高考“替人受过”：现象及其本质	44
高考的社会功能	50
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法规建设述评	
——兼谈考试立法的必要性	56

高考与教育

自主招生改革何去何从	67
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高考录取中的两难选择	80
高考竞争与科目改革	89
试析高考的指挥棒作用	96
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关系新论	100
保送生制度：异化与革新	106
论高考的教育功能	112

自主招生公平问题探析·····	118
自主招生联考：是耶？非耶？·····	126

高考与科举

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	131
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	139
科举至公之道及其现实启示·····	148
科举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 ——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分析·····	160
科举启示录 ——考试与教育的关系·····	171
废科举的教育影响·····	178
高考改革的科举史观照 ——考试存废的视角·····	184

域外高考

我们能从美国高校招生制度借鉴什么·····	195
追求公平：美国高校招生政策的争议与改革·····	201
社会维权系统分担高校招生公平责任：美国的启示·····	207
法国高校招考制度及其启示·····	213
考试社会的域外视角·····	221

报章精论

异地高考：为何千呼万唤难出来·····	229
“减负”应成为一项系统工程·····	233
高校“结盟”：减负还是掐尖·····	235
危机化契机：高等教育的出路 ——对话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郑若玲·····	239
综合素质评价到底应该怎么评·····	242

理性反思“史上最牛高三班”	244
校长推荐在美国也不是主流	246
要防止自主招生变成另一种应试	248
重新审视城市少数民族加分政策	252
学业水平考试：从考试到评价的新起点	254
恶性竞争：招生失序的危险信号	257
以平常心看待“高考状元女多于男”	260
高考改革：守望理想，更应立足现实	262
高考改革首重公平	264
对南科大改革应持平常心	266
多管齐下治理高校生源竞争“混战”	269
破格特招蒋方舟合理吗	272
自主招生会取代高考吗	274
“云海工程”：从单一考试向多元评价转变	277
创特色明定位选拔多样化人才	280
博导的招生话语权亟待扩大	283
大学的魅力在于大师	286
后记	289

高考与社会

高考从表面上看只是为高校选拔新生的一种手段，但它又同时肩负巨大的社会功能，致使其自身发展与外部方方面面因素牵连甚深。高考已成为中国的“举国大考”，其社会功能日益凸显，社会影响日趋深广。对于高考制度的发展与改革问题，也必须置于社会的宏阔背景中加以研究。本单元将探讨高考与社会流动的关系、高考的社会功能及其对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影响，并从社会视角探讨统一高考的建制背景与发展历程、统一高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以及考试立法的必要性。

高考改革必须凸显公平^{*}

高考受多种因素影响，高考改革应该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要求，而公平是首当其冲的。何以如此？我们不妨从考试制度的历史发展中求取借鉴，并从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中寻找答案。

作为一种选优汰劣的制度，考试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汉代。汉代一开始实行察举孝廉的人才选拔制度。由于察举制是由地方官以“孝悌”“廉正”的标准察访并举荐，没有客观的人才考量标准，致使后来出现权门把持、行贿作假等流弊。因此，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继续沿用察举制的同时，又创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士制度。由于同样的原因，九品中正制亦发展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境地，与其创制初衷即所谓取士“盖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已是背道而驰。隋朝创立了举世闻名的科举考试制度，其最大特点，便是具有可操作的客观的人才选拔标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即我们常说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科举不仅奉行“程序公正”原则，而且它在入仕和受教育机会上实行解额分配制，顾及了地区间的公平性。科举之设，在一定程度上选拔出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不问其出身是草根阶层抑或上流社会。比起世卿世禄或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科举具备了某种超越封建性的现代性特点。

历史经验证明，在各种选拔人才的途径中，考试最为公平和有效。对公平竞赛的追求，中外古今，概莫能外。无论是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毁灭，还是科举制的建立和长期存在，都因缘于公平二字。

新中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发展，更彰显了公平因素的重要性。1952年，新中国建立了统一高考制度。由于历史与政治原因，高考制度从一开始即身兼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和选拔后备干部的双重任务。统一高考之建立，除效益和质量的考虑外，更有追求公平之本源因素。统一考试正是从制度上排除了考试之外的人为因素的干扰，有效地保证了考试的公平与健康发展，使全体国民享有平等参与接受高等教育和追求社会地位竞争的机会。而“文革”时期统一高考的废止，使高校招生的公平性受到践踏。

^{*} 原载《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7期转载；《高等教育》（人大复印资料）2005年第7期转载。

高考自恢复至今的 20 余年里，在以全国统一的文化考试为根本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不动摇的同时，也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改革。回顾这些改革，但凡涉及公平性，无不引起社会上下的深切关注，有些改革甚至因不公平而难以善终。例如，在招生体制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的招收委培生和自费生改革，本是一种有助于解决高等教育中长期存在的“产销不对路”矛盾之良策，可发展到后来，因收费和降分挂钩，“权力干预”、“分不够钱来凑”等不正之风趁机而入，严重破坏了高校招考的公平原则和损毁了高等教育的社会声誉而终遭唾弃。在考试内容方面，近年来加试外语口语和考测实验能力的改革，以及考试命题中出现的城市倾向性，对教育资源占弱势的农村考生群体而言，其公平性也甚为民众所质疑。在保送生制度方面，问题更为严重。实行保送制度的本意是为了弥补高考笔试的不足，创设一种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然而，人为因素的干扰，很快就将这一良法美意异化为“推劣不推良、送官不送民”，致使操作环节严重失范。难怪很多人指责保送生制度是中国教育领域最大的腐败。在录取制度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而增加的投档比例的改革，却造成录取季节“条子票子满天飞”的“奇观”，使高考这块社会净土遭致人情、权力和金钱的严重侵蚀。20 世纪末推广的网上录取改革，出发点之一正是为了杜绝各种非成绩因素对录取造成的困扰，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原则。此外，各省市录取分数线的失衡，也成为近年“两会”热议的话题，人们期望通过统一高考分数线来纠正目前存在的不同省市间考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竞争不公平的现状。

2004 年，11 个省市实行自主命题，成为高考改革最新的热门话题。2004 年 1 月，教育部要求天津、江苏、浙江、福建等 11 个省市按照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实行自主命题，2005 年在全国推广。自主命题对于绝大多数省市而言还是新鲜事物。从 2004 年的实际运作看，自主命题的试点较为平稳，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不少省市的调查反映，自主命题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推进高中课程改革，考题难度较以往更小。

但毋庸讳言，自主命题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考题押中率增高。由于自主命题只从本省中挑选命题人员，命题人员和教师互动的概率，较之从全国范围挑选命题人员的全国统一命题肯定更大。因此，自主命题一方面减少了因一省泄题波及全国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在抵御高押题率、人情请托和特权干涉等方面，却可能低于全国统一命题。由此也会带来新的公平问题。此外，不少人认为自主命题的权威性不及全国命题。客观上讲，各省命题在命题水平和管理经验上，一时确难企及全国命题，命题质量势必受到影响。而命题质量即试题信度、效度和区分度的高下，又直接关系到考试选优汰劣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到考试的公平性，考试的权威性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因此，要使自主命题在全国顺利推广，各省市应在题库建设、命题人员培训、命题管理等方面花大力气，使自主命题在不降低命题质量的

前提下，达到促进各地素质教育、规避全国范围泄题风险的目的。

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命题：公平是任何社会永恒的诉求。在日益追求公平、公正与效率的今天，任何一项制度，其生存或发展空间的大小，已越来越取决于其程序的公正程度。考试制度的改革，若改掉公平，就等于革自己的命，这似乎成了考试历史上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中国这样一个尤重人情关系、社会资源相对紧张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民众的公平忧患意识与渴望也较别国更为强烈。“不患寡而患不公”是社会大众的普遍心态，亦是对高考改革的现实心态。在高等教育供需矛盾尚较突出的情况下，确保教育机会公平乃高考改革第一要义。即使在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的今天，乃至迈入普及化的明天，也仍存在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公平仍是且将一直是高考改革的基本要素。

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以厦门大学为个案*

社会流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人们在各种社会集团内部、各种社会集团之间,以及在各种活动空间之间变动、转移的形式和过程。^①作为考察社会动态结构变化以及衡量社会开放和发展的重要指标,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一般认为,社会流动有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两种基本类型,其中,垂直流动是指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人或群体跨越等级(或阶层)界限的位置移动情况,根据移动的方向,又可进一步分为上向流动和下向流动。由于垂直流动可以给处于较低地位的人提供破坏不平等制度的动力,因而高的社会流动率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释放较低阶层的不满,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

社会流动受政治、经济、教育、地理、人口乃至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考试特别是大规模考试也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在中国这个考试的故乡,考试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是个古老的话题。对于历史上科举引发的社会流动,历史学和社会学界的研究兴趣一直不减,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研究,成果都很多,各种观点的争鸣互动也颇为热烈。^②与科举不同的是,高考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领域,却远不及前者热闹。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忽视,原因之一在于几乎没有人怀疑高考促进社会流动、平民子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事实。那么,高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流动?其影响受到何种因素的制约?应如何认识高考在二元结构社会解体和社会稳定中的作用?这些问题甚少被关注。本文拟以厦门大学为个案,通过对建国前后学生社会阶层变动的实证调查,试图探究高考制度对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的影响力,并由此分析它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一、研究综述与调查概况

由于高考建制时间仅 50 余年,人们对它的研究兴趣多数时候集中于这一制度

* 原载《教育研究》2007 年第 3 期;《高等教育》(人大复印资料)2007 年第 6 期转载。

① 程继隆编:《社会学大辞典》,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0 页。

② 刘海峰:《科学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6~245 页。

本身的改革与完善。有关高考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这一问题,到近些年才出现一些研究成果。一般而言,学界对社会流动问题多通过统计流动率来进行定量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以定性方法为主,且多停留于感性的泛泛而谈,缺乏深入的学理层面的思考。

(一) 研究综述

笔者视野所及对这一问题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两项:一是张宝昆的著作《大规模教育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研究》,二是李家林的论文《论考试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

在《大规模教育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研究》一书中,作者首先对科举考试控制社会流动的历史作了简要的定性考察,认为科举除造成并控制了向上社会流动之外,也间接地对其他形式的社会流动(如水平流动和向下流动等)造成影响。作者特别对考试控制社会流动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得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35次高考(除去1950年、1958年和“文革”11年),促成了1 354.05万人的向上流动^①(“文革”前15年录取了200.95万人,1977~1996年共录取了1 153.1万人,其中,农村人口约占50%)。作者据此认为,高考制度(尤其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充当了促进社会流动并控制这种社会流动的角色,起到了一个社会安全阀的重要作用。^②

《论考试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一文,也主要从定性的角度论述考试如何促进合理社会流动的形成。作者认为,考试通过其本身的规范效应来规范社会流动行为,从而强化社会流动的有序性;通过考试政策的制定,来协调控制社会流动的流速和流量;通过考试内容或标准、考试结果等来促使社会主客观目标之间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考试通过其公平性和规范性,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的价值取向起良好的导引作用。当然,这些作用的实现均须基于考试制度科学、合理这一前提。^③虽然此项研究中的社会流动并非特别指向阶层流动,考试也并非专门指向高考,但对我们研究高考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上两项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包括高考在内的大规模考试制度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所做的也基本上是定性综合研究,而且没有进行统一高考与非统考办法的对比。从这一角度看,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力之大小,基本上是一个空白的研究领域。尽管与之相关的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均未将视角直接落到高考制度的分析上。

^① 需要指出的是,张宝昆所提及的35次高考促成1300多万人的向上流动有失准确,因为录取人数中有部分人只是实现了阶层的水平流动而非向上流动(这里涉及阶层的界定问题)。显然,在上大学与向上流动之间并不能简单画等号。

^② 张宝昆:《大规模教育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09页。

^③ 李家林:《论考试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载《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二）调查概况

人们在研究科举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时，惯常的方法是对比科举与之前各种人才选拔制度下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同理，高考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大小，也要通过与未采行高考时期学生阶层分布的对比来体现。鉴于新中国从 1952 年建立统一高考制度后，除“文革”11 年，其余时间均采行这一制度，而“文革”的情况又十分特殊，难以进行常态比较，因而我们只能对比建国前未采行统一考试时期和建国后采行统一高考时期的情况。

具体而言，本文是通过对比统一高考建制前后学生家长职业构成的差异，来分析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这就要求调查的学校一定要在统一高考建制前成立，且建校时间越长越理想。厦门大学作为一所具有 80 多年历史的综合性重点大学，无疑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厦门大学于 1921 年建校，其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学生档案也被保留了一部分。但这些纸质文献毕竟保存时间已长达数十年，且历经数次政治运动的破坏，很多档案要么缺失，要么因虫蛀或发霉而难以认读。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设法浏览了厦门大学几乎所有建国前的学生档案，通过查阅学生家庭状况、教育环境调查表、国立厦门大学人事调查表、入学志愿书、清寒学生调查表、学生人事考查表、学生自传等文献，共得到文理各院系学生档案 3 141 份，其中，有家庭出身情况记载的有效样本计 2 356 份。相比之下，建国后的档案要齐全得多。笔者分别查阅了 1950 ~ 1952 年、1965 年、1976 ~ 1980 年各年的学籍表，得到学生档案共计 6 465 份。建国前和建国后档案总计 8 821 份，采用 Excel 进行归类。与建国后分年或分阶段统计不同的是，建国前各年由于性质基本相同，且样本较少，被统一归为“建国前”大类。调查对象系别分布广泛，涉及当时几乎所有系别。

二、统计与分析

在本调查中，家长职业（以父亲为依据来统计，极少数父亲情况不详而母亲职业详者，则以母亲为据）被划为工、农、军、学、政、商、其他七大类，其中，工包括工人、职工和手工业者；农指农民；军包括普通军人和军医；学包括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医生和科技人员；政指干部（包括农村干部）；商包括商人、华侨和侨店员，其他包括非农（据其综合信息推断不是农民者）和失业者。

在我们对职业所划分的七大类中，学、政、商界的职业因占有较多的文化、政治或经济资本而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认为这些领域的职业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而工、农界职业的社会地位则较低，无论是从社会声望、经济收入还是文化资本的占有上看，都可以认为是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当然，某些职业或阶层由于种种原因在建国前后所享有的政治或经济地位可能略有不同，但总体上看，其社会地